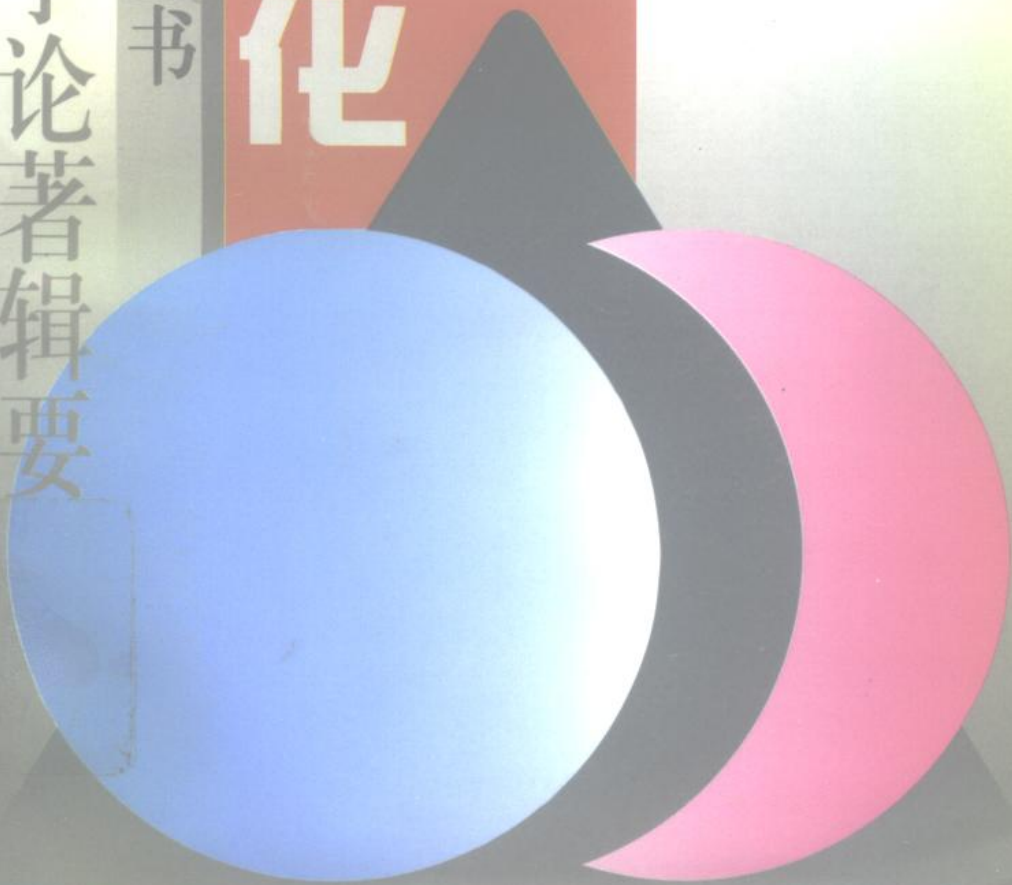


八五国家重点图书

精神自由
与民族文化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

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



93415

D244.0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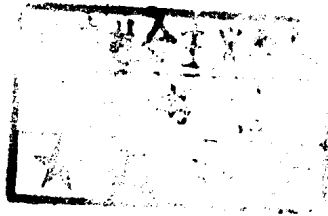
——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

精 神 自 由

与

民 族 文 化

吕希晨 陈 莹 选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
——张君勱 新儒学论著辑要

吕希晨 陈莹 选编

责任编辑：罗林平

封面设计：李 萌

版式设计：张智勇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真武庙二条九号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1.625 印张 454 (千) 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43-2177-X/G·800

定价：21.60 元

(京) 新登字 097 号

《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方克立

副主编 张品兴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克立	宋连昌	宋志明	余新华
张品兴	罗林平	郑大华	郑家栋
高聚成	徐少锦	焦树安	

总 序

五年前，“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对于人们来说还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在今天，它们不仅已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报刊上、书册中，而且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

现代新儒学本来是七十年前就已经在中国大陆产生、经过了三十年奠基和发展的一个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前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都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解放后，作为一个思潮和学派来说，因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而不可能在中国大陆继续存在和发展，它的阵地遂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而就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来说，现代新儒学并没有断绝薪火，

在第二个三十年它又经历了新的重要的发展阶段，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更有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由于海峡两岸隔绝三十多年，国内的读者对这些情况均难以知悉，并在一再“批儒”的气氛中对这种思想感到十分隔膜。

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國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自然不会放过返归本土的机会。主要是通过一些海外华裔学者的努力，积极推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儒学复兴”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文化讨论的现实感受加并不遥远的历史的回顾使人们很快地接受了“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的概念。

关于现代新儒学，现在人们谈论得很多，但是由于研究刚刚起步，资料掌握还很不齐全，特别是对于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家学者，研究资料尤其匮乏，因此人们的认识难免是笼统浮泛的、很不一致的，包括现代新儒家的对象、范围、代表人物、发展阶段、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问题，在认识上都颇多歧义。至于更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新儒学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开新，对近现代西学的融摄和“儒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敌视和某种意义上的启示；这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派别是怎样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它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贡献是什么而限制又是什么，它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前景，等等，都有待于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才有可能作出切实的回答。

对于一切研究者和关心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人来说，占有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原原本本地弄清现代新儒家学者都写了和说了些什么乃是首要的前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精选的系统的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第一手资料。它不同于国内已经出版的众多新儒学评论集、港台海外新儒家论文选集和新儒家个别著作的重印本，而是力图从反映整个思潮发展的角度，将现代新儒学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挑选出来，分别汇编成册，以便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新儒学思想的实质及其个性特征。为了帮助青年读者正确认识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各册编者分别撰写了“编序”，除了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外，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有关思想资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评论。

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采取了广义理解的“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概念，即超越了新儒家学者之间的师承、门户之见，把在现代条件下重新肯定儒家的价值系统，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的那些学者都看作是现代的新儒家。这套“辑要”所选的十五位作者，涉及“五四”以来的三代人，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是相当明显的，但是都不乏上述“共性”。他们中的马一浮、方东美、余英时、成中英等人，能否归属于现代新儒家的范畴，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这里提供了一批反映其新儒学思想

倾向的资料，特别是集中反映其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观和哲学思想，希望有助于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精神方向作出符合实际的定性判断。当然这决不是说，他们的思想不可能包含矛盾，不可能表现出多样的形态，但这些资料至少对了解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作一种简单的是非评判，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一条更有效的、更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可动摇，怎样更好地结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利用我们传统的资源，怎样更好地吸收别的国家现代化成功的经验和域外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包容性最大的、最富有民族特色和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索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以宽阔的胸襟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致力于民族振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并且也确实在某一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的思想派别，包括那些曾经批评和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派别。他们的思想主张中哪怕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也应该加以厘清，加以肯定，批判地借鉴和吸收。现代新儒学在维护和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民族虚无主义、融合中西哲学和文化、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等方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份思想财富我们就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和批判地继承。所以，这套“辑要”决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一套供批判用

的“反面教材”，而应该看作是中国人的现代智慧的一部分，是一套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名著。所选十五位作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都堪称名家，把他们的代表作称为“名著”并非言过其实。当然，“名著”中所写的不见得都是真理，我们也不赞成“复兴儒学”的观点，但是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来研究，包括它的错误亦能给人某种启迪。如果大家能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出版这一套书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

方克立

1990年11月8日

编 序

一、张君劢的生平与著述

张君劢是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阐扬儒家传统文化，力倡“唯实的唯心主义”，鼓吹建立“修正的民主政治”，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张君劢，名嘉森，字君劢，一字士林，号立斋，笔名君房，英文署名 Carsun Chang，别署世界室主人。上海市宝山县人。1887年1月18日生于嘉定县城的一个商宦之家。祖父铭甫出身举人，历任四川内江、屏山、垫江知县，颇

有政绩。父祖泽，上海名医。张君勖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二。六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十二岁奉母命考入西式学校广方言馆，学习英文与数理化。同时兼由袁观澜授以《三通》（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戊戌政变发生后，他见清廷缉捕康有为、梁启超的通令大为不满，遂起反清救国之念。1902年应宝山县乡试，考中秀才。次年考入教会学校震旦学院，读拉丁文，从院长马相伯学习西方哲学与历史，但不久因家道中落而失学。第二学期考入南京高等学校，旋因列名参加抗议俄国入侵东三省，被校长勒令退学。不久，经人介绍，先后赴长沙明德学校及澧州与常德中学任教。

1906年春获宝山县公费选派，东渡日本。初入高师理化部，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预科，学习政治学、国际法、宪法、财政学与经济学。同时自学德文。1907年应梁启超之约，参加创建政闻社。次年又代表政闻社返国发动宪政运动，因之触犯清廷，随即返日。1909年在东京参与成立“咨议局事务调查会”，出版《宪政新志》。次年获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1年回国参加清政府的殿试，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返宝山任县议会议长。1912年赴北京任农商部秘书。1913年经俄赴德，考入柏林大学，继续学习政治学与国际法。1915年秋离德去英国伦敦，转道法国、比利时、瑞典与俄国，于1916年3月回国。出任浙江省交涉署署长，不久又回上海任《时事新报》总编辑。先后担任段祺瑞所设的“国际政务评议会”的书记

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与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1918年与梁启超一起离沪西行，考察欧洲各国战后情况。游欧途中曾去耶纳访问德国哲学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张氏大受感动，随后于1920年移居耶纳，从倭氏专攻哲学。次年又与倭氏合著《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一书。不久又赴法国和柏格森研讨中西各种哲学的比较。年底偕杜里舒启程回国。

1922年为杜里舒在国内讲学担任翻译，同时应邀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负责起草《国宪大纲》，并著《国宪议》一书。1923年2月，发表《人生观》的讲演，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极力提倡柏格森主义与宋明心学。同年又在上海筹办自治学院，并自任院长。1924年学院奉令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张仍出任校长，兼讲《唯物史观批判》等课。1928年约李璜在上海创办《新路》半月刊，接受拉斯基的政治多元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力提倡“民主政治”与“民主的社会主义”。1930年担任燕京大学教授，主讲黑格尔哲学。1932年与张东荪、胡石青等在北京秘议创立中国国家社会党。同时创办《再生》月刊，发表《我们要说的话》、《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与讲演。1934年7月，在国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是年发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提出“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乃民族今后政治学术之方向之总原则”，这是他表述文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次年编辑论文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强

调“民族之自救，在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为基础”。1937至1938年，先后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国防参议会，并被聘为国民党参政会的参政员。同时发表《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要求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发表《立国之道》一书，主张建立“修正的民主政治”和“国家社会主义下的计划经济”，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设计了一个理想的蓝图。

1940年张君勱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并自任院长，明确提出“为往圣继绝学”，发挥中华民族立国精神，以期担负起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任。同时撰写《胡适思想路线》等文章，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柱石，批评胡适“一切皆以欧洲前人为蓝本”与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思想方法。1941年接受梁漱溟、左舜生等建议，联合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等，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与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张又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次年，发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强调“以人民为基本之宪法”，才是“国家立长治久安之基础”，表现了他的现代新儒家的宪政观念。国社党与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作，成立了“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又被选为主席。次年民主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通过党章、政纲及宣言，张仍被选为主席。1948年先后到上海、四川、湖北等地，到处发表讲演。曾主讲《民主社会之哲学背景》、《民主

政治的哲学基础》、《新道德之基础》、《现代文化之危机》等十余题，主张发展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认为人权在哲学上的意义是拿人民当目的不是当手段，只有在长久的和平中，自由、民主才能加强和深刻化。1949年10月飞抵台北会晤蒋介石，旋即返港召开民社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他实际上基本上脱离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49年11月，应印度教育部的邀请，从澳门赴印，先后在十一所大学讲《中国哲学》、《中国政党之发展》、《儒家受佛教影响后之复活》等。1951年底离印，随即赴印尼、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香港和日本，开始第一次环球讲学。1952年4月去美国西雅图定居。1955年由牟宗三将其历年所著关于王阳明的文章，汇为《比较中日阳明学》一书正式出版。同时应旧金山华侨之请，于孔教总会讲授《义理学十讲纲要》，这是一部坚持精神决定历史文化的唯心主义著作。1956年迁居旧金山，并应《世界日报》之聘，担任撰写社论，两年来所发表的主要社评87篇，后由邹自强编为《张君劢新大陆言论集》一书。同时陆续在《祖国》周刊上发表《辩证唯物主义驳论》，肆意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但知有物不知有心有精神”；“但知有物之变而不知有物之常或曰不变”；“但知有斗争与对立而不知有和协与相容”；“但知有阶级而不知有个人”；“但知有革命而不知秩序维持之可贵”。

1957与1962年，先后出版英文论著《新儒家思想史》上、下两册，这是张氏后期推动儒学复兴活动的一部重

要著作。他认为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是一个博物馆”，它是会永远持续发展的，是永远不会死灭的。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并不逊色，中国学者的创造性思维决不落后于人。这与民初以来对民族文化自蔑自弃的学风和世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8年元旦，由他倡导并联合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共同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就是著名的所谓“当代新儒家宣言”。该文进一步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活的机体，是一个大生命，从而把现代新儒学运动及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同年又获澳洲孟氏基金资助，赴德国、英国、印度、越南、日本等欧亚诸国，以中国儒学复兴为主题，作第二次环球旅行讲学，1959年1月，《亚细亚》杂志出专号《张君勱博士滞日讲演特集》一册。返美后再为《世界日报》撰写社论，又在加州蒙特瑞大学讲《中国印度之哲学思想》。八月，在台北民社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主席。

从1960年起，在《人生》、《东西哲学》等杂志上，连续发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文章，明确提出“唯实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专著《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一书，也由圣约翰大学出版。1963年应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联合书院之邀，前往讲学。为纪念人生观论战四十周年，发表《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主要思想家的基本观点。坚持

人生观是“非科学公例所能规定”的看法，认为“人生观是人生观，哲学是哲学，形上学是形上学，此三者不可与科学混而为一，合而一之为两伤，分而离之为两美”。1965年在旧金山创立“自由中国协会”，在香港创办《自由钟》月刊。四年间撰写了《自由中国协会缘起》、《国民心理之转移》、《新儒家政治哲学》、《文化核心问题——学问之独立王国论》、《明日之中国文化再版新序》等三十余篇论文，为在世界范围内复兴中国儒学作出了很大努力。应邀赴朝鲜汉城出席“亚洲现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发表题为《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的著名论文，力陈儒家思想足可为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因为“儒家思想的复兴有助于或者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是使现代化在更稳定更坚实的基础上生根和发展的方法。同年，“东方人文学会”为庆祝张氏八十寿辰，邀请全球汉学家撰写论文，出版《儒学在世界》文集，他自撰《孟子哲学》一文入编，谢众位盛意。1967年应李光耀之邀，赴新加坡讲《社会主义运动概观》、《一百五十年之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礼记》中早已含有社会主义思想，申言社会主义应公有与私有并存，须靠有效率的政府去执行。12月在美伊里诺大学讲《中国对于西方挑战之反映》。1968年12月20日，所著《孟子与柏拉图》稿尚未成，因病入柏克莱康凡勒生疗养院。1969年2月23日因脑充血而猝然逝世。

张君劢的一生是阐扬儒学的一生。半个世纪以来，他在不忘怀于实际政治的同时，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述，主要专

著有：《明日之中国文化》、《立国之道》、《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王阳明哲学》、《义理学十讲纲要》、《辩证唯物主义驳论》、《新儒家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中国专制君主制之评议》等。他的绝大部分论文、序跋、函牍、札记等，均被收入程文熙编辑的《中西印哲学文集》中。

二、张君劢的新儒学思想

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新儒学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主要阐述、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是玄学派的主要代表，他明确提出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的，科学对人生观无法解释。“诸君平日所学，皆科学也。科学之中，有一定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人生日用之中的绝大多数问题，科学是不能解释的，都是“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此何物欤？曰，是为人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07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张君劢还举出九项例子说明科学对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所谓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私有财产制与公有财产制，守旧主义与维新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我主义与利他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